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

马大正卷



兰州大学出版社

跬步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马大正卷:跬步集:新疆史探微/马大正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11-02083-2

I. 当... II. 马... III. ①社会科学一文集②马大正一文集③新疆一地方史一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63 号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马大正卷

跬 步 集

——新疆史探微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市残联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083-2

全套定价:180.00 元
(共十册)

“丛书”总序

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克非先生对我说，要为六十岁以上、七十岁左右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出版一套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自选集。其中，史学类要我帮忙编选十卷一辑。我想，这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八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多有出版家为他们周密策划出书事宜。有的大学者的文集、文选不知重复出版了多少套，而六七十岁的少名或无名的“青年老头”却少有人来问津。说穿了是因为后者的著作不能为出版者赚钱，甚至还要蚀本。第二，是有官衔的“学者”，因为有权势在手，不管他有学问没学问，也有办法（例如用公款支付出版费用，甚至公然买书号）令出版社为自己出文集、文选。据我所知，某些“长”字号的此类书籍，就是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版的。即使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他们也会巍然送入，到处张扬。这两条理由，不知道克非先生是否认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盛情，令我感动和钦佩，因而不辞自身学养之浅陋，当即答应为他们选荐作者。出版社的标准就是我的选荐标准：只问学问，不问官职；只选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或略大于

七十岁的学者。这时，我不由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段话：

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科学技术专家，一到六七十岁退休的年龄，有的耳有点不聪，有的目有点不明，难以再进实验室，拿手术刀手也发颤，只好退而且休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到了这样的年龄却是如日中天，正是读书写作的大好时候。即使耳目有点小毛病，甚至大毛病，也无大碍。此时，他们书读得越来越多了，知人论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了，通古今之变的本领越来越高了，究天人之际的愿望越来越旺了，即使遵章退休，也往往是退而不休。

我完全赞同季老的高论，且有所补充。照我看，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在人生和学术道路上坎坷多难，饱经风雨沧桑，不乏伤心切肤之痛。然而，他们从未颓唐不振，反而因为心灵深处拥有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和敢于重新评估一切的怀疑精神，使他们晚年生活追求中始终不曾忘却对人文社会科学尽自己一份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虽面对权威和虚假，却甘于清贫和寂寞，以信念、醒悟和批评，诉求真实，尊重歧异，鄙弃教条，质疑权威，敢于应对非学术因素干扰下学术领域的种种挑战。

我的专业是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史，所知只有一百多年的史事，而对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则知之甚少。不负所托，为了审慎地选荐丛书各卷作者，我便向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和老朋友请教。世界史，我请教于苏俄史专家陈之骅先生；中国古代史，我请教于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之骅谦虚地说他自己的文章暂时没有时间整理，他诚恳地推荐英国史专家王章辉先生，王先生欣然俯允。春瑜除承诺自编一卷外，又热心推荐汉唐史专家张泽咸

先生、宋辽金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张、王两先生亦积极响应。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我敦请王桧林、张注洪、马连儒、唐宝林四位先生予以支持。桧林先生以主编《中国现代史》（高校教科书）、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抗日战争史而名满学界。注洪先生以研究中国现代史科学与信息学而著称。马连儒编审主持《人物》杂志多年，对中国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既深且精。唐宝林研究员近二十年间以研究陈独秀和托派历史知名于海内外。在以上八位先生的选荐过程中，我始终在寻找马大正先生。他是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专家，我虽不研究边疆史地，但一向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正其时正在新疆考察，直到一个月后才联通敲定。

九位先生中，六位是旧雨，三位是新朋且从未见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汉、唐、宋、辽、金、明、清、民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和英国史诸学科。我稟性愚鲁，才疏学浅，对上述许多领域相当外行，不敢妄评诸公学术成果，但据平时涉猎，参照学界品评，我深信他们都是各自学科中的一流学者。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以其非凡的学术成果为本学科作出了独特的有些是无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这种贡献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们摆脱了长期流行并主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元思维定势”，即非好即坏、非美即丑、非善即恶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可以提出种种批评见解，但在学德和文品上，他们绝不会愧对广大读者，这就是：

——历史家的第一品格是真诚，是无所禁忌，秉笔直书，而非附庸政治的奴婢。

——历史学的第一标准是真实，是信史，是史镜，而非“胜利者的宣传”。

我坚信，这应当是时下和未来历史学主体和客体的正确的发

展方向。这也是高悬于我和所有作者面前的崇高的目标，追求之心不敢稍懈。

陈铁健

壬午谷雨后四日，京东亮马河畔水南斋

自序

按丛书体例的要求，需要一篇自序，想到自己已年过还历，在研究的岗位上也持续学习和工作了40余年，对所走过的路做一次简要的回眸，当也在情理之中。

我的研究生涯自始至今大体上可分为入门、始步、拓展三个阶段。

1960年至1964年，为研究的入门阶段。时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徐绪典教授，致力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研究生论文题为《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在此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的基础知识。更难忘的是，绪典老师教会了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实现了对历史学由无知到稍知的过渡，所有这一切成了我终生受益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4年至1987年，为研究的始步阶段。1963年研究生毕业，1964年仲夏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工作，一晃10余年，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研究工作无缘，而是身不由己地翻滚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但凭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

面、长知识，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本身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一课，无疑大大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对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1975年秋冬，我终于得到了参加工作以来第一个研究课题的机会——参加《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我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也即始于此时，此项研究真正全面展开已是科学春天降临人间的1978年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工作起步是顺利的，因为从大环境言，我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从小环境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而且在我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即得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与启迪，他是我始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工作之始，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术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了指导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1982年在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后，又开始了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1984年，我有幸参加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的撰写，分工隋唐民族史，并于1986年完成了书稿。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我对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于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此期间我担任了《民族研究》的兼职编辑和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组织和撰写工作。由此不仅锻炼了我的编辑能力，也大大扩展了个人与学术同行的交往。所有这一切均为我日后研究领域的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7年至今为研究的拓展阶段。198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已生活、工作20余年的民族研究所，以及与我有着共同

M. D. D. H. N. G. P. U. L. N.

志趣、和谐合作的学术伙伴们，到了创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个人的研究领域也从民族史扩大到了中国疆域史。为推动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拓展到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20 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等方面。90 年代以来，又主持并参加了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对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方方面面始有涉猎，同时为推动边疆学科的建设，又将自己研究视角转向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上。当然，卫拉特蒙古史、清代新疆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止。

回顾这些年治学的实践，经验谈不上，心得则有四条：

一是，求真求实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所谓求真，即要追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永远是研究遵循的准则；所谓求实，我理解是研究者要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中国边疆这个研究对象现实感特别强，研究者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二是，资料收集是研究的基础。要千方百计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相关的文献、档案，当时人的记述，同时代人的记载，民族文字的记载对边疆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资料的鉴别则是研究的开始，对任何史实，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而比较是鉴别真伪的可靠方法。

三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边疆研究工作者来说实地调查尤为重要，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到边疆地区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大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四是，研究视点选择的正确是研究成功的重要保证。研究中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的入门，而宏观研究则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宁可小题大做，而不能大题小做。研究时要心有全局，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做到分则为文，合则成书。

到我这种年岁，来日苦短之感在所难免。依我目前的自我感觉，再工作 20 年不敢妄言，但继续爬 10 年格子（自惭至今尚不会敲键盘）的大话还敢说。10 年岁月，近 4000 个日日夜夜，可做的事应该可以很多，我以为大可不必沮丧，更无需宿命，在争取有一个好身体，保持一个好心态的前提下，做好几件事，还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目下我想到的，也是最想做的有这么四件：

一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再深化一步。这是一个大题目，个人的能力是难以完成的，但我想从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做些探索，即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东北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希望能留下一些可以称得上研究的作品为后人关注。

二是，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这同样也是一个大题目，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是想静下心来将自己对边疆学科建设的思考理清后，写出一本关于中国边疆学如何建构的札记。

三是，尽力做一些边疆学科的普及工作，尤其是边疆考察的普及，尝试以随笔的形式将 20 余年来自己深入边疆的见闻写出来，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

四是，培养几名中青年有实力的边疆研究者和博士生，他们应是 21 世纪中国边疆学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

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祝愿中国边疆学早日诞生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兴旺发达。

果能如此，当是人生之大幸矣！

本集定名为《跬步集——新疆史探微》，正题寓意于自己研究历程的记录，副题则是让读者一目了然于本书的内容主题。之所以本集只选收有关新疆史方面的作品，自感对新疆历史的研究至今仍是我研究的主要方面。

本集共分四辑：一辑收论文 6 篇，主要是清代新疆地方史的

论文；二辑收论文6篇，主要是清代新疆民族史，特别是卫拉特蒙古史的论文；三辑收论文6篇，主要是有关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考释文章；四辑收文1篇，是我新疆考察的一篇随笔。

中国边疆研究涉及内容丰富多采，“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似苍穹，似大海。而自己所涉猎内容当在其中，但似流星，似水花。如果收入本集的论文于读者常有些许参阅价值，斯愿达矣！

2002年2月15日

于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目 录

丛书总序	1
自序	1
新疆历史纵论	1
清政府治理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	24
清朝统治新疆时期的动乱事件	42
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	62
20 世纪新疆考察述论	86
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	108
卫拉特蒙古历史概述	121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	168
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	190
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	207

渥巴锡论

——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231
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	269
民国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亲王帕勒塔	288
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	302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考	318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路线考述	
——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	326
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	334
土尔扈特蒙古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史事述补	345
新疆和硕特蒙古札萨克印考	350
天鹅的故乡	357
跋	项怀诚 374
后记	375

新疆历史纵论

一、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

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了解现代，进而为解决现代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对新疆的历史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同样不例外，如果不了解新疆历史，就可能认不清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无法制订正确的解决之策，要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新疆问题，要站的高，基点之一是先辈们对新疆进行了开拓和开发，基点之二是我们的前人在认识新疆、研究新疆方面有着丰富的积累。

新疆及其周围地区在我国古代称为西域，我们的先辈早在先秦时期就使这一地区和内地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我国先秦古籍中大量有关西域的记载、传说，与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由西域玉石制作的陪葬品相互印证，为我们勾勒出了远古时期西域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壮丽画卷。公元前1世纪，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驻军屯田、设官立府、施政管理，西域和内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先辈们对西域开拓和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之后的我国历代王朝，不管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唐、元、清以

其强盛的国力，不仅持续地对现在的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开发，而且也将其周围地区纳入到了管辖范围之内，设官立府、驻军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文化，不断将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推向高潮。就是在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分裂政权鼎立或林立的状态下，我们的先辈也没有废弃对西域的开拓和开发。尼雅，位于今新疆民丰北的沙漠中，地处尼雅河下游，本世纪初斯坦因在考察尼雅遗址时发现了有关魏晋王朝在此屯田的木简，这是魏晋王朝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见证。只是到了近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清朝国力日衰，列强的蚕食鲸吞使大片领土从母体上被割裂出去，形成了我国新疆现在的疆域状况。回顾先辈们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和内地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公元前1世纪西域和内地融为一体之后，我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与开发尽管有过挫折，乃至断裂，但经过了挫折时期之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往往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开发高潮，这些持续不断的开发高潮使西域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进入近代以来列强处心积虑企图将新疆分裂出中国的目的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先辈开拓和开发西域的过程中，先辈们对西域的探索和研究也同时展开了。流传至今的《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典籍中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古代西域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应当是先辈们探索和研究西域的最早成果。之后，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先，内容浩繁的二十四史大多为西域立传；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类史书、以《通典》为代表的政书类史书、以《高僧传》为代表的传记体史书、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的地图类史书等，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有关西域的各方面状况，这些成果都是先辈们关注、探

索、研究西域的结果。至清代，专门探索和研究西域的官方典籍、私人著述更是不胜枚举，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对我国边疆的蚕食鲸吞，先辈们的探索和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形成了以祁韵士、张穆、何秋涛、徐松、魏源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在前辈们的成果中，既有对西域地理、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自然人文情况的描述，也有对历代王朝治理和开发西域政策的得失，各民族或政权之间关系等众多方面的探讨和总结。

先辈们对新疆的探索和研究，在为后人提供浩如烟海的资料、奠定研究基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也给予后人以极大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众多的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纷纷加入到探索和研究新疆历史的行列，从不同的方面，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使其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

二、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需要具有科学的态度、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在长期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得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有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归宿点就是：第一，新疆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新疆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对于远古新疆居民的族属，我国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唯以“西戎”称之，但对古人类头骨的测定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的居民分为东西两大人种，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人种逐渐占据了优势。秦汉之际，来自于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羌人等纷纷迁入新疆，而塞种人则迁至了帕米尔高原地区，及至匈奴兴起，匈奴人不断涌入新疆并

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公元前1世纪，伴随着西汉在西域统治秩序的建立，汉人日渐成为新疆众多古老民族之一。汉代以后，更多的古代民族纷纷进入到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而尤其以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为最多，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蒙古人先后涌入。这些民族和当地民族在辽阔的西域生息繁衍，在共同开发西域的同时，相互之间或和或战，不断融合，新疆地区的一些现代民族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诞生的。至清代，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再次迁入，最终形成了新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新疆的历史，既是一部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对西域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管辖在唐、元、清三朝时期不断得到加强，长期有效的统治不仅为上述各民族相互交流、共同开发西域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地加速着这一地区和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这一进程受到了严重阻挠。但尽管如此，在清末国力衰微、民国初期军阀割据，中央王朝对新疆控制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列强处心积虑想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仍然没有得逞，这表明新疆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也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三、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

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疆历史，首先应该对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以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